政治科學論叢／第 91 期／民國 111 年 3 月／頁 49-84

第二次安倍政權長期穩定執政之研究：以非民意支持導向的政策爲焦點*

吳明上**

摘　要

第二次安倍政權爲何能夠長期穩定執政？以往的研究大多從國政選舉的勝利與官邸主導的確立等面向來解釋。本文無意否定或質疑以往的研究成果，而是擬以「非民意支持導向的政策」（non-responsive policy）爲切入點，解釋第二次安倍政權長期穩定執政的原因。

以往的研究認爲第二次安倍政權與第一次最大的不同，在於致力推出迎合民意的經濟政策。但是，本文發現安倍首相在第二次政權期間，卻也陸續推出非民意支持導向的政策。安倍首相在推出政策之後，內閣支持度雖然一度下降，但是又會再度回升，此種模式一再地出現，是以往少見的現象。安倍首相爲何執意推出「非民意支持導向的政策」，以及如何維持（提升）內閣的支持度，是本文探討的主要目的。

本文研究發現，安倍首相維持內閣支持度的策略有二：一是在國政選舉前提出迎合民意的經濟政策，再以勝選後的新民意爲藉，推動非民意支持導向的政策；二是安倍首相在第二次政權期間，藉由不斷地提出新政策或政策構想，塑造出內閣一直正在做事的形象，藉以減緩非民意支持政策的衝擊，同時也維持政權整體的好感度。

關鍵詞：自民黨、第二次安倍政權、內閣支持度、國政選舉、民意導向政策

---

* DOI:10.6166/TJPS.202203_(91).0002

** 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E-mail: meizyou@isu.edu.tw。

收稿日期：110 年 11 月 15 日；通過日期：111 年 3 月 29 日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壹、前言

第二次安倍政權是長期且穩定的政權。安倍晉三以自民黨總裁的身份於 2012 年 12 月 16 日的眾議院選舉中，率領自民黨打敗執政的民主黨，成功奪回政權；接著於同月 26 日組閣執政，開啓第二次安倍政權的序幕，直到 2020 年 9 月 16 日因病辭職下臺才劃下句點。安倍首相不論是連續在職日數（2,822 日），或是通算在職日數（3,188 日），都分別超越了佐藤榮作的 2,798 日，以及戰前桂太郎的 2,886 日，創下了日本憲政史上的紀錄。

第二次安倍政權也是相對穩定的政權。若與統治機構改革後的政權相較，[1] 第二次安倍政權相對地穩定。從「表 1」能夠清楚地看出，第二次安倍政權的標準差數值爲 7.39，[2] 低於其他政權，是統治機構改革後相對穩定的政權。

表 1 統治機構改革後歷代政權標準差數值一覽表

政　　權	在職日數	最高支持度	最低支持度	平均支持度	標準差
小泉政權	1,980 天	85%	42%	54.5%	10.89
第一次安倍政權	366 天	65%	29%	45.0%	10.33
福田政權	365 天	58%	20%	37.5%	12.47
麻生政權	358 天	49%	15%	29.0%	11.98
鳩山政權	266 天	72%	21%	50.3%	17.56
菅直人政權	452 天	65%	16%	34.9%	15.17
野田政權	482 天	60%	20%	33.1%	10.79
第二次安倍政權	2,822 天	66%	34%	48.1%	7.39

備註：森喜朗首相於 2001 年 1 月中央省廳組織調整時，進行內閣人事調整以為因應，並非統治機構改革後新成立的政權，因此不列入表格資料。森首相於同（2001）年 4 月 26 日下臺。

資料來源：1. 在職日數根據首相官邸（2021）「内閣制度と歴代内閣」整理而成

2. 最高支持度、最低支持度、平均支持度的數值是根據「NHK（2021）世論調査内閣支持率」整理而成

---

1 統治機構改革是指政治改革與行政改革，前者透過選舉制度改革等措施，將政黨的權力集中到以黨魁爲中心的黨中央，後者則是透過中央省廳改革與權力的重新配置，來強化首相的領導能力，統治機構改革強化了執政中樞的權力，改變了日本政治的權力結構。

2 「標準差」是指一組數值自平均值分散開來的離散程度的一種測量觀念。一個較大的標準差數值，代表大部分的數值和其平均值之間差異較大（起伏程度較大）；一個較小的標準差數值，代表這些數值較接近平均值（起伏程度較小）。換言之，就政權的穩定度來看，標準差數值越大，表示政權越不穩定，標準差數值越小則政權越穩定。

臺灣人文社會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往的研究大致從國政選舉的勝利，以及官邸主導的確立等因素來說明第二次安倍政權長期穩定執政的原因。本文無意否定或質疑以往的研究成果，而是擬從「非民意支持導向的政策」（non-responsive policy）爲切入點，來解釋第二次安倍政權長期穩定執政的原因。一般普遍性的見解認爲，第二次安倍政權與第一次最大的不同，在於安倍首相不再標榜「擺脫戰後體制」的右傾化路線，而是採取迎合民意，重視經濟的路線。然而本文發現，安倍首相在第二次政權期間也陸續推出「非民意導向的政策」。而在政策推出之後，內閣支持度雖然一度下降，但是又再度回升，此種模式一再地出現，是以往少見的現象。安倍首相有了第一次政權的經驗，爲何在內閣支持度可能受到影響之下，仍然執意推動非民意導向的政策？而在內閣支持度下降之後，爲何還是再度回升，安倍首相的政權運作手法爲何？此些問題是本文的探討對象。

貳、既有研究與問題意識

以往對於第二次安倍政權長期穩定執政的研究，大致聚焦於國政選舉的勝利與官邸主導的確立等面向，以下先說明各相關研究發現，接著再說明本文的問題意識。

一、國政選舉的勝利

日本的國政選舉包含被稱爲「政權選擇選舉」的眾議院選舉，以及被稱爲「政策績效評價選舉」的參議院選舉。安倍晉三於 2012 年 9 月當選自民黨總裁後，經歷三次的眾議院選舉（2012 年、2014 年、2017 年）與三次的參議院選舉（2013 年、2016 年、2019 年），均獲得勝利，創下六連勝的紀錄，建立起「自民黨一強」的政黨政治體制，或「安倍一強」的自民黨權力結構。

國政選舉勝利的政治意涵包含以下二個層面：一是眾參二院多數席次的取得，二是「分立國會」的消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 眾參二院多數席次的取得

第二次安倍政權是自民黨與公明黨合組的聯合政權，從「表 2」能夠看出，自民黨與公明黨在六次的國政選舉中，都取得過半數的席次，在眾議院更是取得三分之二以上的絕對優勢，在完全執政下掌握了決策的主導權。

自公兩黨能夠取得國政選舉的勝利，主要有三個要素：一是選舉制度的效果，二是自公兩黨的選舉合作，三是推出重視經濟的政策。

首先，關於眾議院選舉制度的效果方面。Christensen (1994: 602)、岡田憲治（2019：48）指出，眾議院的新選舉制度雖然是小選舉區與比例代表等二種制度的混合，但因以下二種特殊的設計，導致不利於小政黨的生存。第一是偏重小選舉區的設計。小選舉區不利於小政黨的生存，日本選舉制度中，小選舉區的席次數目明顯高於比例代表區，例如 2017 年的眾議院選舉時，小選舉區的席次數目爲 289 席，佔總席次 465 席的 62.2%，而比例代表區爲 176 席，僅佔總席次的 37.8%。第二是比例代表區的設計。日本的比例代表區的席次計算是將全國劃分爲 11 個比例區，分別依照各該比例區的得票率計算應得的比例席次，與一般將全國作爲 1 個比例區的狀況不同，日本的設計較不利於小政黨取得比例代表的席次。

表 2 自公兩黨國政選舉結果的席次佔比

	自民黨 (A)	公明黨 (B)	總席次 (C)	(A+B) / C
眾議院選舉				
第 46 屆（2012/12/16）	294	31	480	67.7%
第 47 屆（2014/12/14）	291	35	475	68.6%
第 48 屆（2017/10/22）	284	29	465	67.3%
參議院選舉				
第 23 屆（2013/07/21）	115	20	242	55.8%
第 24 屆（2016/07/10）	121	25	242	60.3%
第 23 屆（2019/07/21）	113	28	245	57.6%

備註：依照「票票等值」的《憲法》精神，眾議院於 2014 年與 2017 年，參議院於 2019 年調整選區席次數目，因此總席次略有變動。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選舉關連資料」（總務省，2021）整理而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再者，Lijphart (1994: 58)、王業立（2001：13）、大山禮子（2018：146）也都表示，小選舉區是「勝者全得」（winner-Take-All）的制度，具有議席比例往往高於得票率的「比例性偏差」（disproportionality）的現象，對大政黨明顯有利。從「表 3」能明顯看出，自民黨在小選舉區的席次率遠遠高於得票率。在日本的場合，加上自民以外的在野黨無法整合，故使自民黨在眾議院選舉中獲利（菅原塚，2016：38-39）。

其次，關於自公兩黨的選舉合作方面。中北浩爾（2017：135-155；2019：303-335）分析指出，自民黨在逐漸失去傳統農業的選票下，還能夠在國政選舉獲勝的主要原因是與公明黨進行緊密的選舉合作，而且合作程度相當細緻，例如候選人的提名作業經過仔細的協調，同時兩黨相互推薦候選人，以利選票的極大化，加上自民黨與公明黨的政黨屬性不同，選票並無重疊，因此能夠發揮互補的效果。自民黨與公明黨於 1999 年 10 月開始合組政權（自自公政權），並於 2000 年的眾議院選舉開始進行選舉合作。田原總一郎（2019：266-313）詳細說明自民黨與公明黨合作的源由，主要是自民黨考量到在眾議院選舉逐漸失去選票的優勢，而公明黨擁有 800 萬的創價學會成員，簡單計算的話，在選舉合作下，將會在每個眾議院小選舉區帶來 2 萬票的合作效果，有利於取得勝選（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4a）。因此自民黨拋棄以往攻擊公明黨政教不分的立場，由官房長官野中廣務、國會對策委員長古賀誠、前幹事長加藤紘一透過公明黨幹事長冬柴鐵三的管道推動自公兩黨的政權合作與選舉合作。自公兩黨合作迄今，期間雖然經過政黨輪替一度曾爲在野黨，但是兩黨的合作關係未曾中斷。

最後，關於重視經濟的政策方面。藥師寺克行（2014：262）、大嶽秀夫（2020：253）、松岡信之（2020：52）都研究指出，安倍首相記取第一次政權（2006 年 9 月～2007 年 9 月）的教訓，改採民意支持導向的重視經濟

表 3　自民黨在衆議院小選舉區的議席數與得票率

	總 席 次	獲得議席數	席 次 率	得 票 率
第 46 屆（2012/12/16）	300	237	79.1%	43.0%
第 47 屆（2014/12/14）	295	223	75.6%	48.1%
第 48 屆（2017/10/22）	289	218	75.4%	47.8%

資料來源：筆者依照選舉結果自行製表而成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資料庫

成長的路線，是第二次政權的特色。安倍首相於第一次政權期間，大力標榜「擺脫戰後體制」、「美麗國家」，於 2006 年 12 月通過修正《教育基本法》、2007 年 1 月將防衛廳升格爲防衛省，以及 2007 年 5 月欲通過修改《憲法》必要程序的《國民公投法》等右傾化的政策，然而不受民意歡迎，是導致政權失敗的主要原因。

因此安倍晉三於 2012 年 12 月重返執政後，記取第一次政權的教訓，便改變了以往的政策路線，特別是國政選舉之際，極力推動重視經濟的政策。例如，安倍首相重返執政後，立即提出眾所矚目的「安倍經濟學」，透過積極的金融政策、靈活的財政政策、構造改革的經濟政策等「經濟三枝箭」來促進經濟成長；又例如，安倍首相二度延緩提升消費稅（詳細請參閱後文的「圖 1：國政選舉前後政策路線變化圖」）。

(二) 分立國會的消除

白鳥浩（2016：20-27）指出，「分立國會」的消除是安倍政權穩定運作的主要因素。「分立國會」是指執政黨雖然在眾議院擁有過半數席次，但是在參議院卻未能取得過半數席次的狀況。

爲何執政黨失去參議院的過半數席次，會阻礙政權的運作？竹中治堅（2010：7）、向大野新治（2011：327-372）、吳明上（2016：3-6）都指出，參議院在政權運作過程中，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力，主要的理由有三：一是參議院擁有延宕法案審議的權力；[3] 二是眾議院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席次，始能再度表決推翻參議院的決議，但是一般而言執政黨難以跨越此門檻；三是參議院「究責決議案」（日文爲「問責決議案」）的政治效應。[4] 受到「分

[3] 參議院收到眾議院通過的法案後，除國會的休會時間外，有 60 天的審議時間（憲法第 59 條第 4 項）。換言之，參議院若對眾議院通過的法案有異議時，擁有 60 天的延宕時間。通常國會的會期爲 150 天，因此，如果參議院對法案與眾議院抱持不同的立場，則參議院的 60 天延宕時間，可嚴重壓縮國會的審議時間。

[4] 「究責決議案」是追究政府的政治責任，參議院若對首相或大臣通過「究責決議案」，則表示參議院否定首相或大臣的政治家資格，因此得以在審議法案時，拒絕首相或相關大臣出席，或拒絕審查各該相關法案。就對內閣而言，無法出席重大法律案或預算案的審查會進行說明，審議便會陷入膠著，政策法案無法通過，施政便會空轉，對內閣造成嚴重的打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立國會」的掣肘造成國會空轉，政策難以推動導致就任首相一年便辭職下臺的福田康夫便有所感地指出：「『分立國會』的現象好比雙引擎飛機失去一個引擎一般，無法取得政權的平穩運作（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07）。

第二次安倍政權於 2012 年 12 月上臺時，即面臨著「分立國會」的窘境，安倍首相遂將新內閣定位爲「危機突破內閣」，視翌（2013）年的參議院選舉爲新政權的最優先課題。安倍首相於 2013 年 7 月的參議院選舉中獲勝，成功地取得過半數的席次，消除了「分立國會」的狀況；接著在 2016 年與 2019 年的參議院選舉中，連續取得過半數的優勢，直到政權結束時，「分立國會」的窘境不再出現。

二、官邸主導的確立

關於官邸主導確立的研究有二個面向：一是人事權的掌握，二是被稱爲「首相的賢內助」的內閣官房長官的研究。

(一) 人事權的掌握

上川龍之進（2016：123-129）研究指出，第二次安倍政權成立後，安倍首相對於以往獨立性強的機關首長人事，例如日本銀行總裁、NHK 局長、自民黨稅制調查會長、內閣法治局長等，都對該機關的人事制度或慣例進行介入，任命首相屬意的人選，藉以制定出符合首相政策意圖的政策。

朝倉秀雄（2016：237）、牧原出（2016：71-76）則注意到 2014 年 5 月 30 日設立的「內閣人事局」的政治效應。內閣人事局的設立是爲了將各省廳的人事制度進行一元化的管理，消除省廳本位主義的弊端，內閣人事局長由內閣官房副長官擔任。以往在內閣官房長官主持的人事檢討會議中，僅針對局長以上約 200 名的幹部進行考核；內閣人事局成立後，考核的對象擴大到各省廳的次官、局長、審議官等約 600 名的幹部（田上嘉一，2017）。不僅如此，原先的制度設計是由內閣官房的事務副長官（文官系統的杉田和博）擔任，但是在安倍首相與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的強力介入下，改由政務副長官（政治家加藤勝信）擔任。政務官是由首相政治任免的職位，換言之，首相得以透過內閣人事局，對中央各省廳幹部的人事進行實質的政治任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水唯一朗（2017：146-148）則進一步指出，在首相的人事主導下，霞關（中央官廳所在地）的官僚爲求取晉升機會揣摩上意，逐漸形成所謂的「官邸官僚」的現象。在內閣人事局的政治效應下，容易產生「揣摩上意」，以安倍首相爲馬首是瞻的官僚（古賀茂明，2020：157-190）。「揣摩上意」日文爲「忖度」，「忖度」一詞雖然不是日本人日常慣用的語詞，但是於 2017 年卻獲得日本自由國民社主辦的「流行語大賞」的年度流行語，在日本社會出現的政治效應與影響可見一斑。

(二) 內閣官房長官的角色

關於內閣官房長官的研究方面，包含制度與行爲者等二面向。首先，關於制度方面。前內閣官房副長官石原信雄（2005：23）指出，作爲直接輔佐與支援首相機關「內閣官房」在行政改革下，強化了決策過程中的主導地位。田中嘉彥（2015：53-82）進一步指出，首相對於內閣重要政策的基本方針具有主動的提議權，而且作爲首相輔佐機關的內閣官房，亦得以從「制定計畫、擬定草案」的初步階段便開始主導，不再只是以往政策草案制定後的綜合協調。換言之，官邸正式地從官僚手中取得政策制定過程的主導權，從以往的「官僚主導」轉變爲「官邸主導」。在第二次安倍政權期間，內閣官房的組織規模不斷地擴大，專任職員的總員額也持續擴編。從表 4 能夠明顯看出，第二次安倍政期間，國家公務員的總員額雖然有增有減，但是上下起伏不大，反觀內閣官房的總員額卻是逐年一路增加，2014 年超過 1,000 名，2017 年超過 1,200 名，足見內閣官房在第二次安倍政權中的重要性。

表 4 第二次安倍政權期間國家公務員與內閣官房之總員額

年　　份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國家公務員	298,341	297,340	297,091	297,073	297,030	297,766	299,271	301,435
內閣官房	884	1,083	1,141	1,175	1,202	1,218	1,245	1,275

備註：國家公務員總員額包含地方警務官，但不包含自衛官。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國家行政機關總員額的推移」（內閣官房，2021）的歷年資料整理而成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其次，關於行爲者方面。菅義偉在第二次安倍政權期間一直擔任內閣官房長官，任期 2,822 日，超越福田康夫的 1,289 日，創下任期最長的紀錄。吳明上（2018：86-98）研究指出，菅義偉在重要決策中，例如經濟主軸的確立、政權的危機管理、眾議院解散的決定、自公兩黨聯合的管道等，均扮演「關鍵角色」，堪稱安倍首相最佳的「賢內助」。清水克彥（2014：39）針對菅義偉的重要性指出，第二次安倍政權成立屆滿一年之際，最大在野黨民主黨代表海江田萬里便表示，民主黨會持續關注安倍政權的關鍵人物菅義偉將擔任內閣官房長官到何時。政治上勁敵的警戒是對菅義偉能力的最大肯定。

在「官邸主導」的決策模式下，「官邸」宛如「內閣中的內閣」，安倍首相當然是最高的政治領導者，但是菅義偉在決策過程中，往往以首相代理人的角色來主導，這樣的政治搭配爲何能夠成功？誠如御廚貴（2015：35）觀察所指出的，究其原因，主要在於安倍首相與菅義偉內閣官房長官之間，存在著全面性的信賴與尊重之故。

三、本文的問題意識

上述的研究觀點能夠有效地解釋第二次安倍政權長期執政的原因，本文無意否定或質疑以往的研究成果，而是認爲有更加深化的空間。本文擬在上述的既有研究成果之上，進一步探討以下二個問題：

首先，以往的研究指出，安倍首相在國政選舉前，推出迎合民意的經濟政策是勝選的原因。然而，筆者檢視安倍首相於第二次政權期間，除了重視經濟的政策外，還推動了諸多非民意支持導向的政策，例如《特定秘密保護法》或《安全保障關連法》等。

確實，經濟是選民投票時的主要考量因素，因此推出重視經濟的政策自然能夠獲得選民的支持；然而，本文認爲，從非民意支持導向政策的推動過程，如果能夠提出內閣支持度下降後又回升的有效解釋，對第二次安倍政權的研究也將更周延。

其次，小澤一郎（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9）、井田正道（2018：159）都指出，第二次安倍政權能夠成爲長期政權，主要的原因在於民主黨政權的失敗。國民對於「民主黨執政毫無章法大失民心」的記憶根深蒂固，即

臺灣人博士論文知識庫

使想要政權輪替，也找不到能夠替代的政黨，從民意調查的結果來看，支持安倍政權最大的比例是「比其他政權（民主黨政權）要好」，因此民主黨政權的失敗是安倍政權存在的原因。

確實，最大在野黨是執政黨執政的主要威脅，[5] 根據 NHK 的民意調查顯示，第二次安倍政權期間，最大在野黨的政黨支持度大多處於 10% 以下的低迷狀態，難以撼動一直處在 30%，甚至超過 40% 以上的自民黨（NHK，2021）。然而，筆者認爲不支持在野黨未必等於支持安倍政權，特別是在推出非民意導向的政策而支持度下降後，也不一定因爲在野黨的因素而給予大力支持，讓支持度再度回升。而且，安倍內閣的支持度雖然因「森友學園」與「加計學園」事件重挫，但是還是再度回升。誠如御廚貴（2018：10-11）表示，如果是以前的政權發生如「森友學園事件」的話，政權早就垮臺了，但是安倍政權卻安泰依舊。安倍內閣的支持度下降後再度回升的現象，不斷地重複出現（請參閱後文之圖 2、圖 3）。因此，在野黨的因素無法充分說明安倍內閣支持度的穩定情形（誠如表 1 所示，第二次安倍政權是統治機構改革後，支持度最穩定的政權）。

基於上述的關心，本文擬將分析的焦點置於非民意導向的政策，探討安倍首相在第一次政權失敗的經驗，在內閣支持度可能受到影響之下，爲何還是執意推出非民意支持導向的政策，該政策對安倍政權有何重要意義，以及解釋在推動政策的過程中，爲何內閣支持度下降後會再度回升，安倍首相的政權運作手法爲何。

參、政策的推動

民主的理念之一是政府對民意做出回應（responsiveness），而民意又可說是民眾偏好的總和，也就是各個民眾對於各項政策的態度或立場可以加總成爲一個方向或是支持的程度（蔡佳泓、俞振華，2011：74）。因此本文所謂的「非民意導向政策」係指未迎合民意偏好的政策，而是否迎合民

[5] 關於第二次安倍政權期間的最大在野黨方面：從政權成立到 2016 年 2 月爲民主黨，2016 年 3 月到 2017 年 9 月爲民進黨，2017 年 10 月以後則爲立憲民主黨。

臺灣人文及社會期刊資料庫

意則能透過民意調查來獲知。

本文在觀察民意對上述政策的態度時，採用政治立場偏右的《讀賣新聞》與偏左的《朝日新聞》的調查資料，以利保持公正的立場。此二家媒體除了每月定期的內閣支持度調查外，也針對非例行性的事件，例如解散眾議院或《特定秘密保護法》的通過等，臨時進行民意調查，觀察民意對特別事件的態度與內閣支持度的變化。[6]

一、政策與民意態度

《讀賣新聞》與《朝日新聞》對於前四項政策的調查結果，都呈現出反對的比例高於贊成的狀況（請參閱表 5）。而對於「恐怖攻擊等預謀罪」的民意調查結果，雖然《讀賣新聞》的贊成比例高於反對的比例，但是有高達 80% 的比例認爲安倍政權並未進行充分的說明，顯示出民意並非完全的支持，《朝日新聞》的調查結果則是反對的比例高於贊成的比例；「自衛隊入憲」方面，《讀賣新聞》的調查結果是贊成比例（44%）與反對比例（41%）出現伯仲的現象，而《朝日新聞》的調查結果則爲反對的比例（51%）大幅高於贊成的比例（33%），可見「恐怖攻擊等預謀罪」與「自衛隊入憲」（自民黨修憲案）都非迎合民意的的政策。

表 5　非民意支持導向政策與民意的態度

政策民調		《特定秘密保護法》(2013.12)	重啓核電廠 (2014.4)	集體自衛權 (2014.7)	《安全保障關連法》(2015.9)	恐怖攻擊等預謀罪 (2017.6)	自衛隊入憲 (2018.3)
民意的態度							
讀賣新聞	贊成	39%	33%	36%	31%	50%	44%
	反對	50%	59%	51%	58%	47%	41%
朝日新聞	贊成	24%	39%	30%	30%	33%	33%
	反對	51%	46%	50%	51%	36%	51%

備註：「自衛隊入憲」是自民黨提出的《憲法》修正草案的內容。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讀賣新聞》與《朝日新聞》在政策推出後最近的民意調查結果整理而成

6 例如《讀賣新聞》從 2012 年 12 月的第二次安倍政權的成立，到 2020 年 9 月的政權結束，總計 94 個月的期間，進行了 111 次的民意調查（內閣平均支持度爲 53%）。

臺灣人文及社會期刊資料庫

安倍首相有了第一次政權的經驗，爲何在內閣支持度可能受到影響之下，仍然執意推動非民意導向的政策？換言之，該政策對安倍政權而言，具有何種意義或重要性？

二、《特定秘密保護法》

日本政府在面對北韓的核武開發、中國海洋權益的擴張，以及國際恐怖主義的活動等威脅下，爲了保障日本國家的安全與國民的生命與財產下，極需與各國，特別是美國建立完善的軍事情報共享機制。2013 年 1 月發生了「阿爾及利亞人質事件」，[7] 日本政府雖然試圖營救，但是因爲情報蒐集不易束手無策，最後 9 名日本人在事件中死亡，1 名下落不明，更使日本政府深切體認到情報共享機制的重要性。

安倍首相於 2013 年 11 月 7 日的眾議院院會便表示，日本建立完善的秘密保全機制是防止情報洩漏以及與世界各國共享情報的基本前提，在確保我國（日本）及國民的安全時，秘密保全法制化是至關重要的課題（眾議院，2013）。曾派駐美國與中國的前外交官宮家邦彥指出，外國往往以日本對秘密保全機制未完備爲由，拒絕提供情報（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3d）。大嶽秀夫（2020：252）進一步指出，美日兩國對於秘密保全機制存在著重大的落差，例如美日兩國對於洩漏重要軍事情報的處罰不同，在美國是判刑 10 年，但在日本則只有 1 年，因此日本難以從美國取得重要的軍事情報。

安倍政府於 2013 年 10 月 25 日經過內閣會議決議後，將《特定秘密保護法》送交國會審議。安倍政府於 11 月 26 日與 12 月 6 日，分別在眾議院與參議院以多數席次的優勢強行表決通過（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3e）。過程中，民主黨等在野黨曾在眾議院提出內閣不信任案，在參議院對安全保障特別委員會委員長中川雅治及少子化擔當大臣森雅子（兼任《特定秘

7　「伊斯蘭聖戰士血盟團」於 2013 年 1 月 16 日襲擊阿爾及利亞東南方的一個石油設施，綁架了數十名外國籍人士，其中包含參與石油設施的日本建設公司「日揮」的 17 名員工。安倍首相立即指示以人質安全爲優先，在營救過程中日本政府雖然試圖透過談判營救人質，但是因情報收集困難束手無策。阿爾及利亞軍隊最後於 17 日開始攻堅，擊敗恐怖主義組織，過程中 9 名日本人犧牲，1 名下落不明，7 名生還，日本政府派出專機於 1 月 25 日載回犧牲者與生還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密保護法》擔當大臣）提出「究責決議案」，但都遭否決。

《特定秘密保護法》將秘密分爲防衛、外交、間諜活動與恐怖主義活動等 4 項目；若洩漏則顯著危及國家安全保障之軍事情報得以指定爲「特定秘密」;行政機關首長每 5 年研判是否延長「特定秘密」的指定時間，「特定秘密」指定時間超過 30 年時，須內閣的承認，最長不得超過 60 年；公務員洩漏秘密最高處以 10 年刑期（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3b）。

《特定秘密保護法》在國會審議過程中，引發輿論各界的反對。參議院院會於表決前夕的 12 月 5 日，在國會周邊出現示威抗議的群眾，甚至在首相官邸外牆出現「NO 秘密」的噴漆字樣（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3c）。民主黨前官房長官枝野幸男表示，應以充實現行的情報公開制度爲優先，逕行制定《特定秘密保護法》實爲不宜（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3a）。《朝日新聞》認爲成立《特定秘密保護法》是藐視《憲法》的愚蠢舉動，行政首長能擅自決定何爲特定秘密，在國民、國會及法案之目所不能及之處製造黑箱，危及《憲法》的國民主權與三權分立的精神（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3f）。

三、重啓核電廠的決定

2011 年的「三一一東北大地震」發生福島核災後，日本的核電廠一度全部停止運轉，翌年日本政府同意重啓 2 座機組運轉到 2013 年 9 月，其後日本進入「零核電」時期。福島核災後，日本大量以火力發電來彌補核電缺口，導致貿易赤字惡化與電價上漲，對日本的經濟與民生造成嚴重的打擊，也波及「安倍經濟學」的成效。

首先，關於貿易赤字方面。日本的貿易赤字於 2011 年出現時隔 31 年的赤字，從 2010 年的 6 兆 6,347 億日幣的黑字轉爲 2 兆 5,647 億日幣的赤字，2012 年赤字再增加爲 6 兆 9,411 億日幣，2013 年再惡化爲 11 兆 4,684 億日幣（財務省貿易統計局，2021：3）。繩田康光（2014：30-32）與林祥輝（2015：2）都指出，發電用燃料輸入的急增是貿易赤字的主因之一。[8] 日本於 2010

[8] 繩田康光除了發電用燃料輸入的急增外，也提出交易條件的惡化、海外生產比例的增加，以及日幣貶值等也是造成貿易赤字的原因。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年進口的石化燃料金額爲 18.1 兆日幣（佔進口總額 29.1%），[9] 而 2011 年以後逐年增加，2011 年爲 21.8 兆日幣（32%），2012 年爲 24.1 兆日幣（34.1%），2013 年爲 27.4 日幣（33.8%）（財務省貿易統計局，2021：3）。其次，加上國際原油與天然瓦斯的漲價，國內電價也隨之節節高升。若以福島核災前的 2010 年度與 2014 年度相較，家庭用電與企業（特別是製造業）用電的價錢分別從每單位 24.4 日幣與 13.4 日幣，漲爲 25.5%與 18.9%，漲幅約爲 25%與 38%，造成民間家戶與企業的壓力（経済産業省資源エネルギー庁，2018：3）。

安倍政府爲了解決此狀況，決定重啓核電廠的運轉，於是於 2014 年 4 月 11 日的內閣會議通過新的「能源基本計畫」（第四次修訂），[10] 將核能定位爲在促進能源供給結構穩定上的重要基載能源，並在確認符合世界最嚴格的標準下，推動核電廠的重啓運轉，[11] 而且，基於電力的穩定供給與地球暖化對策等觀點，在評估確保電力的供給規模下，保留包含新設核能發電廠的選項（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4c）。

新的「能源基本計畫」在內閣會議決定後，引發民意的反彈。因爲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受到原子彈的轟炸，造成巨大的災難與輻射污染的嚴重後遺症，所以日本國民對於核能懷有恐懼的排斥心理，福島核災後，此現象更爲加劇。不僅民意反對，民主黨、[12] 共產黨、社民黨、新黨大地、

---

9 日本進口的石化燃料品項包含未加工原料油、液態天然氣、液化石油氣、石油製品、煤炭等。

10 日本政府於 2003 年 10 月首次制定「能源基本計畫」，作爲中長期能源供給的基本方針，每隔 3 年左右修訂 1 次，第 2 次修訂是 2007 年 3 月，第 3 次修訂是 2010 年 6 月，第 4 次是 2014 年 4 月。

11 日本政府 2015 年 9 月 11 日重啓位於鹿兒島的川內核電廠 1 號機組，結束了日本自 2013 年 9 月以來，維持了將近 2 年的「零核電」時期。

12 民主黨執政的 2010 年 6 月進行第 3 次「能源基本計畫」的修訂，該計畫載明民主黨政府重視地球暖化的對策，努力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並稱「核電」爲同時滿足供給安定與經濟效率的基礎能源，並在確保安全，以及獲得國民的理解與信賴下，推進新增設備、提升設備使用率。但是，2011 年 3 月 11 日東北福島核災事故發生後，民主黨於 2012 年 9 月提出「零核電」的主張，並以 2030 年代爲目標，同時擬將「零核電」的主張載入「能源基本方針」中，但是作業途中發生政黨輪替，之後民主黨遂以在野黨的立場主張「零核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眾人之黨、生活第一黨等在野黨也都強烈反對重啓核電廠，主張「零核電」；甚至前自民黨首相小泉純一郎（2018）也主張「零核電」，提倡自然資源循環的「零核電」社會。

四、有限度的集體自衛權

安倍晉三在擔任首相前，就對於日本無法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政府解釋提出質疑，並主張日本應該能夠行使集體自衛權，以解除《美日安全保障條約》中「片面性義務」的現狀。安倍晉三於 1999 年 4 月 1 日的「眾議院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特別委員會」中表示：「根據內閣法制局的見解，日本擁有個別自衛權，也能夠行使，但是日本雖然擁有集體自衛權，卻不能行使，擁有權利卻無法行使，儼然爲『極爲奇妙的發明』」（眾議院，1994）；而安倍首相對於《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的防衛義務則表示：「該條約爲片面性條約，不是互惠性條約，爲了美日安全保障體制能永續持久，應該改變爲互惠性條約。當條約是互惠性條約時，日本便能正正當當地向美國提出主張。我們有責任將條約修改爲互惠性的條約」（安倍晉三、岡崎久彥，2004：62-63）。現行的《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第 5 條規定，美國對日本受到攻擊時有防衛義務，但是並未提及當美國受到攻擊時日本的防衛義務。

安倍晉三於 2012 年 12 月重返執政後，翌（2013）年 2 月 8 日立即再度召集「安全保障法制懇談會」（召集人爲柳井俊二國際海洋法法院院長），[13] 研究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法理基礎以及與《憲法》的整合性問題。懇談會經過 7 次的會議，於 2014 年 5 月 15 日完成報告書，並提交安倍首相。

---

[13] 「安全保障法制懇談會」於安倍首相第 1 次政權的 2007 年 5 月時成立，召集人柳井俊二於 2008 年 6 月提出報告書時，首相已經從安倍晉三更換爲福田康夫，福田首相對於日本行使自衛權採取消極的態度，因此未有進展。2013 年 2 月 8 日是第 2 次成立，成員與第 1 次相同，成員包含召集人柳井俊二國際海洋法法院院長（前外務省事務次官），以及岩間陽子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教授、岡崎久彥岡崎研究所所長暨理事長、葛西敬之東海旅客鐵道株式會社代表取締役會長、北岡伸一國際大學校長暨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教授、坂元一哉大阪大學教授、佐瀨昌盛防衛大學榮譽教授、佐藤謙世界和平研究所理事長、田中明彥國際協力機構理事長、中西寬京都大學教授、西修駒澤大學榮譽教授、西元徹也隊友會會長（前統合幕僚會議議長）、細谷雄一慶應義塾大學教授、村瀨信也上智大學教授等，總計 14 名，懇談會做爲首相的政策諮詢機構。

安倍首相基於懇談會報告書的建議，於自衛隊成立 60 週年，意即 2014 年 7 月 1 日的內閣會議決定變更《憲法》解釋，容許日本行使「有限度的集體自衛權」[14]（田原総一郎，2019：296-297）。安倍首相表示，日本容許行使有限度的體自衛權，能夠提升美國對日本的信賴感，日本在今後的 50 年是安全的（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4d）。

最大在野黨民主黨反對表示，安倍首相太過依賴美日軍事同盟的嚇阻力，將導致日本陷入「安全保障的兩難困境」，也會引發軍備競賽的惡行循環，最終不利於日本的安全（中內康夫，2014：29）。內閣會議隔天，首相官邸周邊出現抗議人潮，誓言永遠不放棄反對集體自衛權的行使（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4b）。

五、《安全保障關連法案》

安倍內閣決定變更《憲法》解釋，容許行使「有限度的集體自衛權」後，緊接著便積極著手《安全保障關連法案》的立法工作，以落實「有限度的集體自衛權」的行使。安倍政權在經過自公兩黨協調後，於 2015 年 5 月 14 日的內閣會議決議通過《安全保障關連法案》（包含《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與《國際和平支援法》等二法），翌（15）日提交國會審查，並在眾議院與參議院分別於 7 月 16 日與 9 月 19 日強行表決通過。資深媒體人田原總一郎（2020：217）指出，2016 年 9 月在官邸對安倍首相進行深度訪談時，安倍首相表示《安全保障關連法案》通過後，修憲已非當務之急，因爲已經滿足美國對於安全保障體制上的互惠要求，美國方面也不再抱怨了。

然而，《安全保障關連法案》在審議時，國會周邊出現抗議群眾，主張該法案是將日本捲入戰爭的「戰爭法案」，應立即撤回。眾議院審查時，甚至出現執政黨（自公兩黨）推薦的意見參考人長谷部恭男（早稻田大學憲法學教授）在眾議院表示，容許集體自衛權的《安全保障關連法案》是違憲的

[14] 安倍政權向公明黨的堅持做出妥協，在行使集體自衛權時必須滿足以下三要件：一是不僅是日本遭受武力攻擊，在與日本關係密切的其他國家遭受武力攻擊，且此攻擊具有威脅日本的生存、國民的生命安全，以及國民追求自由與幸福權利之際；二是爲排除此狀況，無其他適當的對付手段之際；三是行使必要最小限度之能力。正因爲有此三要件，有別於一般的集體自衛權，故稱爲「有限度的集體自衛權」。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田原総一郎，2019：216），造成安倍政權的窘境，更引發軒然大波。《朝日新聞》於 2015 年 7 月對《安全保障關連法案》是否違憲的問題，向國內 209 名憲法學者進行問卷調查，結果在 122 名回覆問卷的學者中，高達 102 名認爲是違憲的，15 名認爲有可能違憲，只有 2 名學者認爲不違憲（読売新聞政治部，2015：167-171）。

六、恐怖攻擊等預謀罪

安倍首相於 2017 年 4 月 6 日出席眾議院院會審查《組織犯罪處罰法修正案》時表示（眾議院，2017）：

> 世界各地的恐怖主義攻擊事件日益嚴峻，也有日本人犧牲（阿爾及利亞人質事件），三年後東京將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反恐對策是緊迫的課題。爲了對付恐怖攻擊等國內外的組織犯罪，以及與國際社會建立緊密的犯人引渡、搜查共助、情報蒐集等合作關係是不可或缺的。已經有 187 個國家參加了《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日本與其建立合作關係是極爲重要的。

日本的國會雖然於 2003 年承認《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但是國內法一直未能完備，因此尚未完成締約程序。

安倍首相借鏡小泉政權的失敗經驗，[15] 不以新立法的方式，而是在《組織犯罪處罰法》中新增「恐怖攻擊等預謀罪」條文的修正案方式，於 2017 年 3 月 21 日內閣會議通過後向國會提交審議，該法主要著眼於防範恐怖組織犯罪行爲於未然。部分媒體，例如《朝日新聞》仍然沿用「共謀罪」一詞。該法案於 5 月 23 日在眾議院通過，之後在參議院審議期間，雖然民進黨與共產黨等在野黨在眾議院提出內閣不信任案，企圖杯葛審議，但是內閣不信任於 6 月 15 日清晨遭到否決，接著該法案於同日上午在參議院強行表決通過成立（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7a）。該法案在國會審議時，國會周邊出現眾多反對修法團體與人士的抗議。

---

[15] 小泉政權曾於 2003 年的通常國會、2005 年的通常國會，以及 2005 年的特別國會以新法案的型式提出「共謀罪」法案，但是因罪名過於模糊，受到在野黨與民意的反對而受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最大在野黨民進黨認爲，國民對「恐怖攻擊等預謀罪」的最大不安，在於政府可能恣意行使搜索的權力，將會侵犯國民的內心自由。在日本的刑法體系，原則上必須有犯罪的事實才能處罰，但是該法案卻能夠在「預謀階段」（準備階段）便給予處罰，對日本的現行《刑法》體系造成重大的衝擊（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7c）。根據《每日新聞》的統計顯示，在全國性的新聞媒體中，《讀賣新聞》抱持支持的立場，《朝日新聞》與《每日新聞》表示反對的立場，而大多數的地方性新聞媒體與民間團體則抱持反對的立場（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7b）。

七、自衛隊入憲（自民黨憲法修正案）

自民黨於 1955 年 11 月 15 日成立時，因爲現行《憲法》是美國主導下制定的，所以做爲主權獨立國家執政黨的自民黨，將「自主修憲」明記於「黨綱」與「黨的使命」中（自民党，1955）。安倍晉三出身的細田派，源於岸信介領導的「岸派」，[16] 是主張自主修憲的鷹派派閥，在擺脫戰後體制邁向「正常國家」的理念上，修憲是關鍵的課題。安倍首相在奪回政權的 2012 年 12 月的眾議院選舉時，更將修憲做爲自民黨的「政權公約」（manifesto）（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2a）。安倍首相重返執政後，一再地展現出修憲的熱忱與決心。

自民黨修憲推進本部（本部長爲細田博之）遵循安倍首相的修憲方針，於 2018 年 3 月 22 日完成「自民黨修憲草案」，並於 24 日在自民黨總部召開的全國幹事長會議中加以確認，安倍首相於會中表示：「修憲是自民黨成立以來的課題，也是我們這一代要解決的課題」（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8b）。

「自民黨修憲草案」保留現行《憲法》第 9 條第 1 款「放棄戰爭」與第 2 款「不保持戰力」的條文，在第 2 款增加「保持自衛隊」的條文。[17] 新設條文有二：第 1 項是爲了守護日本的和平與獨立、確保國家與國民的安全，自衛隊爲不妨礙採取必要自衛措施的實力組織，依據法律的規定，內

---

16 安倍首相所屬的細田派，其源流爲岸（信介）派、福田（赳夫）派、安倍（晉太郎）派、三塚（博）派、森（喜朗）派、町村（信孝）派、細田（博之）派。

17 自民黨的修憲草案主要是四項改革：一是關於《憲法》明記自衛隊的存在，二是緊急事態條款，三是消除參議院選舉制整合區制度，四是追加教育制度的充實。

臺灣大學政治學期刊資料庫

閣總理大臣爲最高的指揮監督者；第 2 項是依據法律，自衛隊的行動依據國會的承認及其他的統制（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8e）。第 1 項的主要目的有三：一是在《憲法》條文中明記「自衛隊」的存在，[18] 將自衛隊的合憲性質加以明確化；二是不變更以往自衛隊武力行使範圍的《憲法》解釋，避免增加不必要的紛爭；三是將首相的指揮監督權加以明確化。第 2 項的目的則是將國會的統制，以及與首相的指揮監督整合爲「文人統制」並加以明確化。

對自衛隊入憲方面，自民黨的執政夥伴公明黨山口那津男消極地表示，目前修憲的民意並不積極，應儘可能取得多數政黨與民意的支持。在野黨的立憲民主黨表示修憲議題的討論並不充分也不深入，反對自民黨的修憲草案跨越了「專守防衛」的原則。秉持強力護憲立場的共產黨與社民黨則一致譴責自民黨，表示破壞憲政體制而不自知的政黨沒有修憲的資格（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8c）。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森友學園」低價取得國有土地以及財務省對相關文書的處理問題較受媒體報導，也是安倍內閣支持度下降的原因（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8d）。

肆、維持內閣支持度的策略

曾長期擔任首相官邸新聞採訪的《朝日新聞》藥師寺克行（2019）與共同通訊社資深記者池田健夫（堀江浩等，2016：29）都觀察指出，從以往的內閣支持度來看，大多數的內閣在剛成立時，因爲民意的期待感較高，所以支持度較高；經過所謂的「蜜月期」之後便會下降，特別是推出不受歡迎的政策，或是首相、閣員、執政黨幹部發生醜聞之際，內閣支持度會下降的更快，一旦下降之後，便很難再度回升；但是第二次安倍政權的支持度，雖然幾度下降，甚至接近被認爲是「淹水線」的 30%，但是又再度回升，政權期間一直反覆出現此模式，這是以往少見的現象。

從本文討論的非民意支持導向的政策來看，能夠發現安倍首相維持（提升）內閣支持度的策略有二：一是政策的擺盪，二是政權好感度的塑造。

[18] 自民黨於 2012 年 4 月 27 日決定的「憲法改正草案」中，於在第二章的「安全保障」中記載的是「國防軍」，2018 年的草案正式改爲明記爲「自衛隊」。

臺灣人文及社會期刊資料庫

一、政策的擺盪

從「圖 1：國政選舉前後政策路線變化圖」能夠明顯看出，安倍首相總是在國政選舉後推出非民意導向的政策，而在國政選舉前，安倍首相推出迎合民意的政策，以利贏得國政選舉，並在新民意的支持（期待）下拉抬內閣支持度，藉以緩衝選舉後非民意導向政策的衝擊，同時在接下來的國政選舉時，推出迎合民意的政策，再度拉抬內閣支持度。換言之，國政選舉前後，安倍首相的政策在「迎合民意的政策」與「非民意導向的政策」之間來回擺盪。

首先，關於迎合民意的政策方面。根據《朝日新聞》於第二次安倍政權成立之際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希望安倍首相最竭盡心力的政策中，「景氣與雇用」（48%）與「社會保障制度」（20%）名列第一與第二順位（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2b），此結果與其他媒體的調查結果並無太大的差異。從圖 1 來看，安倍首相在國政選舉前，陸續推出「三枝箭」的安倍經濟學、暫緩提升消費稅、變更消費稅增收額的用途、工作方式改革，以及通過 TPP 相關法案等迎合民意的政策。

安倍首相重返執政後，強力推出「安倍經濟學」，受到選民的青睞，順利贏得 2013 年的參議院選舉，在眾參二院都擁有多數席次下完全執政（高安健將，2013：17-25）。消費稅一向被視爲「永田町的惡魔之物」（塩田潮，2010：262-263），既不受歡迎，也會對政權造成打擊，例如 1989 年的竹下登政權開始實施消費稅（3%）、1997 年的橋本龍太郎政權將消費稅提升到 5%，都是造成該政權下臺的重要原因之一（岩崎健久，2019：121-123；359-360），安倍首相二度暫緩提升消費稅的措施，明顯是迎合民意的作爲。

關於消費稅增收額度用途變更方面，安倍首相於 2017 年以此爲由宣布解散眾議院，安倍首相主張將消費稅增收額度中的 2 兆日幣做爲幼兒教育與高等教育無償化等的「社會保障制度」的財源，藉以減緩少子化與高齡化對社會的衝擊。至於「工作方式改革」方面，主要是明訂同工同酬制度、加班時數上限，以及提倡「高度專業制度」（以工作成果而非時間來評價業績）等，在改善「雇用制度」的同時，兼顧生產效能的提升。而關於 TPP 相關法案方面，安倍首相強調「TPP 相關法案」的通過，除了能夠增加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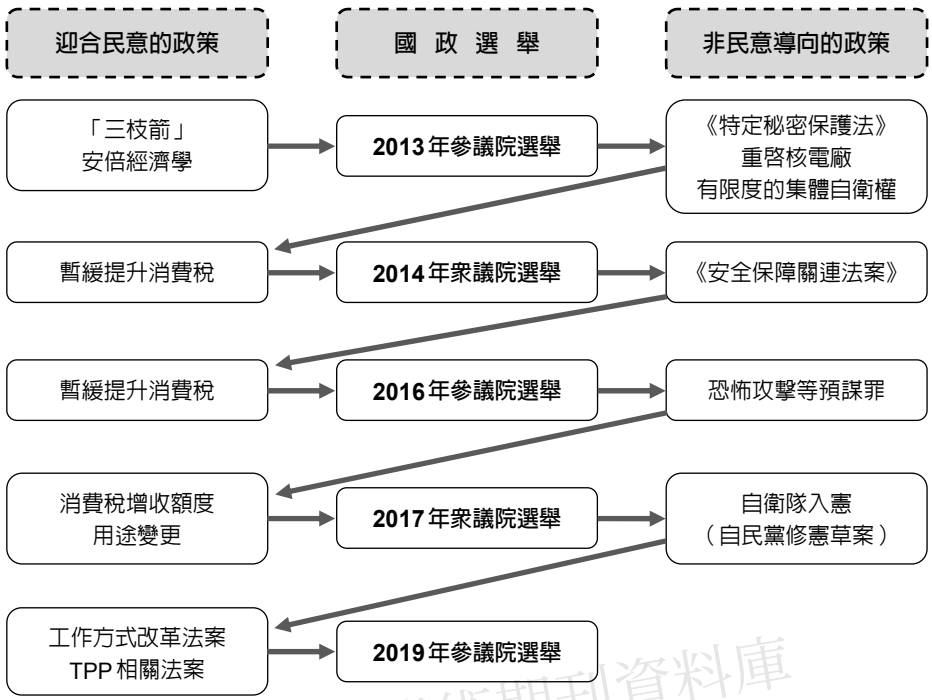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出外，也能夠提升 8 兆日幣日本的 GDP，以及增加 46 萬人雇用的經濟效果（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8a）。

其次，關於內閣支持度的變化方面。圖 1 配合圖 2 與圖 3 來看，不難看出不論是立場偏右的《讀賣新聞》或是立場偏左的《朝日新聞》的調查結果都顯示出，安倍首相在「迎合民意的政策」與「非民意導向的政策」之間擺盪，成功地維持著一定水準的內閣支持度，並未如以往大部分的政權一般，一旦下降便不再回升。

安倍內閣的支持度於 2015 年 9 月與 2018 年 3 月出現大幅度的下降，甚至出現低於不支持度的「死亡交叉」現象。前者是強行通過《安全保障相關法案》之時，後者則是自民黨提出「自衛隊入憲」的《憲法》修正草案，加上爆發森友學園購地相關文件遭到篡改事件之際。《安全保障相關法案》的是非並無定論，但是從前一年「森友學園購地事件」延燒而來的文件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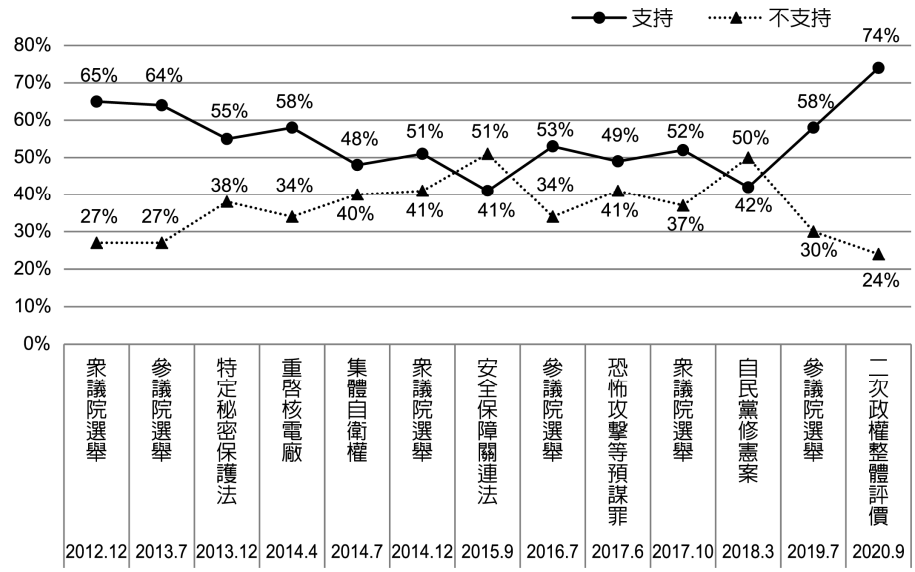
圖 1　國政選舉前後政策路線變化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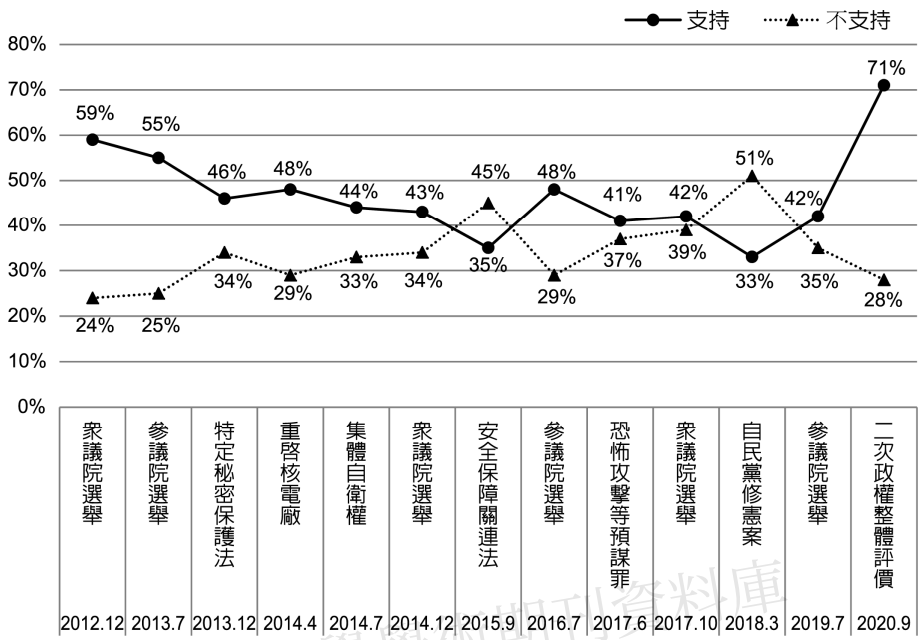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2 第二次安倍政權內閣支持度變化（《讀賣新聞》）



備註：筆者根據《讀賣新聞》的民意調查資料自行整理而成

圖 3 第二次安倍政權內閣支持度變化（《朝日新聞》）



備註：筆者根據《朝日新聞》的民意調查資料自行整理而成

臺灣大學 學術期刊資料庫

改事件，涉及安倍首相個人的操守與誠信問題，對內閣支持度的衝擊不能等同視之，但是內閣支持度在之後還是逐漸回升。

二、政權好感度的塑造

安倍首相除了在國政選舉後以新民意爲藉，推出非民意支持導向的政策外，同時陸續提出諸多的政策或願景，以利塑造政權整體的好感度，同時也能減緩非民意導向政策的衝擊。例如 2012 年重返執政後立即提出所謂的「三枝箭」（安倍經濟學），2013 年提出積極和平主義、第四枝箭（財政健全化）、零待機兒童，2014 年提出女性活躍社會、地方創生，2015 年提出「新三枝箭」、[19] 一億總活躍社會，2016 年提出工作方式改革，2017 年提出人育人革命（人づくり革命）、生產力革命、全世代型社會保障、2018 年提出戰後日本外交總決算，以及 2019 年提出「人生 100 年時代」與「修憲的主角就是你」等。

針對安倍首相的作爲，前首相野田佳彥批評安倍首相不斷地變更口號（slogan），但是結果卻一事無成（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9）。佐藤優、山口二郎（2020：62）也指出，歷代長期政權都留有後人稱頌的政績，例如吉田茂的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佐藤榮作的沖繩反還、田中角榮的日中國交正常化、中曾根康弘的國鐵民營化，以及小泉純一郎的郵政民營化，然而安倍首相矢志修改憲法、北方領土歸還、解決北韓綁架日本人問題等重要的政治課題，但是沒有一件事情完成。雖然如此，安倍內閣爲何還是受到選民的支持？

御廚貴、芹川洋一（2016：19；21-22）指出，安倍首相的目的不在於製造「做了什麼的感覺」（やった感），而是在於製造「正在做什麼的感覺」（やってる感）。安倍首相在接受御廚貴教授採訪時，針對「你認爲『安倍經濟學』成功了嗎？」的提問時親自表示：「所謂的『安倍經濟學』就是『正在做什麼的感覺』，此與成功或不成功無關，正在做什麼比較重要，民主黨什麼都沒做，不是嗎。正在做什麼與什麼都沒做是有很大的差別的」。

[19] 「新三枝枝箭」是指「振興經濟、創造希望」、「未來有夢、強化兒童照護」以及「人人安心、創造社會福利」等三項政策。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爲何塑造出「正在做什麼的感覺」能夠維持（提升）內閣支持度？理由有二：一是安倍首相善於利用媒體的特性。清水克彥（2014：11-12）指出，安倍首相仿效小泉首相，將複雜的政策簡化爲政治語言，例如「以三枝箭作爲經濟政策，強力推動日本經濟」等，直接向國民提出訴求。中野晃一（2016：90-91）與御廚貴（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6）接著指出，安倍首相簡化後的「標語式」（catchphrase）政策，能夠奪取媒體的版面。安倍首相在提出政策後，會在媒體對政策的成果檢驗之前，又再提出新的標語式政策，製造話題，在追求「新」聞的媒體特性下，再度搶攻版面，媒體也不會再追究先前政策的枝微末節，國民對於先前的政策也會逐漸淡忘，如此便能避開媒體對先前政策的檢驗與批判，此模式不斷地在第二次安倍政權期間重複出現。

二是日本文化的特性。誠如經濟學者早川英男（2017：1）指出，在日本有不問成果如何，不會責怪努力的人的文化特性。

安倍首相陸陸續續推出諸多的政策（包含非民意導向的政策）或願景，雖然難以檢測成果，但是呈現出安倍首相努力的執政態度，獲得選民的肯定。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安倍首相於 2020 年 8 月 20 日再度因健康因素辭去首相職位時，民意給予的高度肯定。根據《讀賣新聞》的民意調查顯示，安倍內閣因爲河井克行夫婦的弊案以及 Covid-19 疫情危機處理的遲緩，8 月的內閣支持度下降到 37%，不支持度是 54%，但是安倍首相表示辭職後，內閣支持度上升到 52%，不支持度下降到 38%，是同年 3 月調查以來再度支持度高於不支持度；而且，高達 74%的民意對於安倍首相 7 年 8 個月長期以來的努力給予肯定（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20a），而偏左的《朝日新聞》的調查結果也有高達 71% 給予正面的評價（負面評價僅爲 28%）（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20b）。

伍、結論

安倍晉三於 2012 年 9 月 26 日贏得自民黨總裁選舉後，接著於 2012 年 12 月 16 日率領自民黨贏得眾議院選舉，成功奪回政權，同月 26 日組閣執政，開啓第二次政權的序幕，直到 2020 年 9 月 16 日才劃下句點。若與統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治機構改革後的歷代政權相較，第二次安倍政權不僅壽命長，而且也相對穩定。第二次安倍政權前的六個政權都是短命政權，幾乎是一年一輪替，政壇也因此混亂失常，第二次安倍政權長期且穩定的執政格外受到矚目。

第二次安倍政權爲何能夠長期穩定地執政，是日本政治的研究焦點。以往的研究大致從國政選舉的勝利與官邸主導的確立來解釋。國政選舉的勝利有二個政治意涵：一是眾參二院多數席次的取得，二是「分立國會」的消除。安倍首相重返執政後，在國政選舉上連戰皆捷，不僅在眾議院取得三分之二以上絕對優勢的席次，得以再度表決通過被參議院否決的法案，而且在參議院取得過半數的席次，消除了朝小野大「分立國會」的執政窘境。爲何自民黨能夠在國政選舉連續獲勝？以往的研究指出，要有三個原因：一是被稱爲「政權選擇選舉」的眾議院選舉的制度是以小選舉區爲重心的制度，有利於大政黨的席次取得，加上在野黨整合不力，無法與自民黨對抗。二是自民黨與公明黨進行緊密的選舉合作，加上兩黨的支持者屬性不同，創造出極大化的選票效果。三是安倍首相在國政選舉前，迎合民意推出重視經濟的政策。

其次，關於官邸主導確立的研究方面。以往的研究有二個面向，一是人事權的掌握，二是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的存在。人事權的掌握方面，安倍首相強力介入獨立屬性強機關首長的人事，例如 NHK 局長、內閣法制局長、日本銀行總裁等，以利制定出符合首相政治意圖的政策，「有限度的集體自衛權」的決策便是顯著的例子。而內閣人事局的成立，得以對中央省廳幹部進行實質上的政治任命，在官僚爲求晉升而揣摩上意之下，成爲「官邸官僚」的現象，以安倍首相爲馬首是瞻。內閣官房長官方面，行政改革強化了制度上內閣官房的決策功能，從「制定計畫、擬定草案」的初步階段便能主導決策過程，而第二次安倍政權期間一直擔任內閣官房長官的菅義偉以輔佐的立場運籌帷幄，與安倍首相之間也存在著全面性的信賴與尊重，成爲安倍首相的「賢內助」。

以往的研究認爲安倍首相在第二次政權時，記取第一次政權失敗的教訓，致力推出迎合民意的經濟政策。但是，筆者發現，安倍首相在第二次政權期間，卻也陸續推出「非民意支持導向的政策」。安倍首相在推出政策之後，內閣支持度雖然一度下降，但是又會再度回升，此種模式一再地出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現，是以往少見的現象。本文認爲，從非民意支持導向政策的推動過程，如果能夠提出內閣支持度下降後又回升的有效解釋，對第二次安倍政權的研究也將更周延。再者，雖然以往的研究指出選民不支持在野黨是安倍政權維繫的主因，但是選民不支持在野黨未必等同於支持安倍政權，特別是推出非民意導向政策而支持度下降後，也不一定因爲在野黨的因素而給以大力支持，讓支持度再度回升。安倍首相的政權運作手法爲何，是本文擬探討的問題。

首先，安倍首相在第一次政權的失敗經驗下，爲何仍執意推出非民意支持導向的政策？在本文討論的個案中，安倍首相爲了更加完善美日安全保障體制，建立秘密情報共享機制，推動《特定秘密保護法》；安倍首相爲了改善貿易赤字、企業（特別是製造業）用電、電價節節高昇帶來企業與家戶的經濟負擔等問題，決定重啓核電廠，並保留新建核電廠的選項；安倍首相爲了促進美日安全保障機制的互惠性，決定透過《憲法》解釋日本得以行使「有限度的集體自衛權」，並推動《安全保障關連法案》加以落實，對於該法案的通過，安倍首相表示已經滿足美國對互惠性的要求，修憲已非當務之急；安倍首相爲了因應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舉行，以及對付恐怖攻擊等國內外的組織犯罪，同時與國際社會建立緊密的犯人引渡、搜查共助、情報蒐集等合作關係，推動「恐怖攻擊等預謀罪」的修法工作，安倍首相有鑑於以往的失敗經驗，因此不另立新法，而是在《組織犯罪處罰法》中新增「恐怖攻擊等預謀罪」條文的修正案方式通過；最後，自民黨修憲推進本部遵循安倍首相將「自衛隊」正式入憲的意思，提出修憲草案，爲了儘量避免紛爭而保留《憲法》第 9 條第 2 款的條文，以在第 2 款之下增加「保留自衛隊」條文的方式呈現。在上述政策的決定過程中，安倍首相或憑藉國會的多數勢力強行通過、或未能對國民充分說明解惑、或朝野之間未獲共識之下便強行推動，引發民意的不滿。

其次，安倍首相在面臨（預知）上述的內閣支持度危機時，透過以下二個策略來提升（維持）內閣支持度：第一是利用政策的擺盪策略來維持一定的支持度。安倍首相在國政選舉前後，在「迎合民意的政策」與「非民意導向的政策」之間來回擺盪。若以「非民意支持導向政策」爲觀點來看，安倍首相總是在國政選舉後推出非民意支持導向的政策，而在國政選

臺灣大學 學術期刊

舉前，則推出迎合民意的政策求取勝選，勝選後憑藉著「最新的」民意推出非民意支持導向的政策，緩衝對民意的衝擊，在接著而來的國政選舉前又推出迎合民意的政策。

第二是安倍首相在政權期間，不斷地提出新的政策或政策構想，建構出「正在努力做什麼的感覺」，不僅能夠佔據新聞媒體版面，而且能夠在追求「新」聞的媒體特性下，避免新聞媒體對先前的政策或構想進行檢證或批判，同時能在「不問成果如何，不會責怪正在努力的人」的日本文化特性下，博取民意的好感，維持著一定水準的內閣支持度。

本文同時發現，安倍首相雖然如同以往的研究所指出的一般，在第二次政權期間，致力於推出迎合民意的政策，但是在國政選舉後，卻也往往強勢地推出非民意支持導向的政策。以往對於《特定秘密保護法》等非民意支持導向政策，大致僅針對個案進行討論，然本文透過全面性的檢視後發現，安倍首相在第一次政權右傾化的路線，並非如以往研究所提一般似乎隱而不見，而是顯而易見。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王業立，2001，〈未來立委選制調整的幾個方向及其利弊分析〉，蘇永欽（編），《國會改革：台灣民主憲政的新境界？》，臺北：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頁 13-26。Wang, Yeh-lih. 2001. “Weilai liwei xuanzhi tiaozheng de jige fangxiang jiqi libi fenxi” [Several Directions of the Future Adjustment of the Legislator Selection System: Analysis of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Guohui gaige: Taiwan minzhu xianzheng de xin jingjie* [*Congressional Reform: A New Realm of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ism in Taiwan*], ed. Su, Yong-qin. Taipei: New Taiwanese Foundation, 13-26.

吳明上，2016，〈政權運作與參議院〉，《當代日本研究學會通訊》，1: 3-6。Wu, Ming-shan. 2016. “Zhengquan yunzuo yu canyiyuan” [Government Operations and the House of Councillors]. *TSCJ Newsletter* 6: 3-6.

吳明上，2018，〈第二次安倍政權成爲穩定政權之研究：從內閣官房長官角色分析〉，《遠景基金會季刊》，19(3): 67-108。Wu, Ming-shan. 2018. “Dier ci anbei zhengquan chengwei wending zhengquan zhi yanjiu: Cong neige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guanfang zhangguan juese fenxi" [A Study on the Stability of the Second Abe Administration: The Role of the Chief Cabinet Secretary]. *Prospect Quarterly* 19(3): 67-108.

林祥輝，2015，〈日本核電廠重啓運轉之發展現況〉，《能源知識庫》網頁，https://km.twenergy.org.tw/Document/reference_more?id=103，2021/10/3。Lin, Xiang-hui, 2015. "Japan hedianchang chongqi yunzhuan zhi fazhan xiankuang" [Development Status of Restarting Operation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in Japan]. in https://km.twenergy.org.tw/Document/reference_more?id=103. Latest update 20 July 2021].

蔡佳泓、俞振華，2011，〈地方政府如何回應民意？以 2006-2007 年爲例〉，《台灣政治學刊》，15(1): 73-136。Tsai, Chia-hung & Eric Chen-hua Yu. "Difang zhengfu ruhe huiying minyi? Yi 2006-2007 nian wei" [Evaluating the Responsiveness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Policies and Public Opinion between 2006 and 2007]. *The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5(1): 73-136.

二、日文部分

NHK, 2021,〈世論調査内閣支持率〉, NHK web ページ, https://www.nhk.or.jp/senkyo/shijiritsu/, 2021/12/31。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07,〈政権迷走：自民党総裁選　福田氏と麻生氏、識者に聞く〉,《毎日新聞（夕刊)》, 9/15: 11。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2a,〈自民党の政権公約案　衆院選の公約〉,《朝日新聞》, 11/28: 5。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2b,〈朝日新聞社世論調査　質問と回答〉,《朝日新聞》, 12/28: 5。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3a,〈秘密の妥当性、司法が確認を」保護法案巡り民主・枝野氏〉,《朝日新聞》, 10/13: 4。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3b,〈秘密保護法が成立　機密情報　他国と共有〉,《日本経済新聞》, 12/7: 1。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3c,〈秘密保護法案　参院委可決　大声飛び交う中採決　国会周辺では市民らデモ〉,《読売新聞》, 12/6: 38。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3d,〈特定秘密保護法成立 運用面の設計焦点に：どう変わる 漏洩を厳罰化 主要国並みに〉,《日本経済新聞》, 12/8: 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3e，〈秘密保護法　成立　自公賛成　み・維は退席〉，《読売新聞》，12/7: 1。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3f，〈秘密保護法成立　憲法を骨抜きにする愚挙〉，《朝日新聞》，12/7: 12。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4a，〈[政治の現場] 公明党 50 年 (4) 学会票　発言力を左右〉，《読売新聞》，11/11: 4。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4b，〈あきらめない 官邸前で反対集会 集団的自衛権閣議決定〉，《朝日新聞》，7/3: 1。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4c，〈「原発ゼロ」転換、明記、エネ基本計画　閣議決定〉，《産経新聞（夕刊）》，4/11: 1。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4d，〈集団的自衛権閣議決定　首相「今後 50 年安全だ」〉，《産経新聞》，7/2: 1。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6，〈後継不在 首相の弱点〉，《読売新聞》，7/26: 4。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7a，〈「共謀罪」法、奇策で幕切れ 自由・社民が牛歩〉，《日本経済新聞》，6/16: 4。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7b，〈共謀罪：大半の地方紙懸念　全国紙社説は論調分裂〉，《毎日新聞》，3/30: 11。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7c，〈「共謀罪」対抗の構え　野党 4 党、内閣不信任案を検討〉，《朝日新聞》，6/9: 4。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8a，〈TPP 関連法案、採決目指す与党「46 万人の雇用に」〉，《朝日新聞》web ページ，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L6V32WVL6VULFA002.html，2021/7/1。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8b，〈首相「改憲結果出す」自民　4 項目の条文案説明　全国幹事長会議〉，《読売新聞》，3/25: 1。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8c，〈自民改憲　野党反発強く　専守防衛逸脱を警戒　森友文書問題も波及〉，《読売新聞》，3/25: 4。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8d，〈［スキャナー］「森友」直撃 内閣支持急落 文書書き換え〉，《読売新聞》，3/20: 3。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8e，〈基礎からわかる自民改憲案〉，《読売新聞》，3/26: 8。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2019，〈なぜ、政権を倒せないのか〉，NHK web ペー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ttps://www.nhk.or.jp/politics/articles/feature/26402.html，2022/1/1。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 2020a,〈安倍內閣支持 52%　辭任表明後 15 ポイント上昇〉,《読売新聞》，9/7: 2。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 2020b,〈安倍政権を「評価」71%　コロナ巡る指導力　評価二分〉,《朝日新聞》，9/4: 3。

小泉純一郎，2018,《原発ゼロ　やればできる》，東京：太田出版。

大山礼子，2018,《政治を再建するいくつかの方法》，東京：日本経済新聞社。

大嶽秀夫，2020,《平成政治史》，東京：筑摩書房。

上川龍之進，2016,〈日本政治と制度改革〉,「新しい時代の台日関係：社会科学の学術なダイアログ国際的シンポジウム」論文（12 月 17 日），台北：政治大学日本研究學位學程。

井田正道，2018,《日本政治の展開》，東京：北樹出版社。

內閣官房，2021,〈国の行政機関の定員の推移〉，內閣官房 web ページ，https://www.cas.go.jp/jp/gaiyou/jimu/jinjikyoku/satei_02.html，2022/1/2。

中內康夫，2014,〈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容認と安全保障法制整備の基本方針〉,《立法と調査》，356: 23-40。

中北浩爾，2017,《自民党：「一强」の実像》，東京：中央公論新社。

中北浩爾，2019,《自公政権とは何か》，東京：筑摩書房。

中野晃一，2016,《つながり　変える私たちの立憲政治》，東京：大月書店。

石原信雄，2005,〈內閣と自治体の機能はいかに强化されるべきか〉,《法律文化》，17(40): 22-25。

白鳥浩，2016,《二〇一三年参院選　アベノミクス選挙》，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

田上嘉一, 2017,〈安倍一强を支えるメカニズム　ーなぜ强い內閣は生まれたのかー〉,《Yahoo Japan ニュース》web ページ，https://news.yahoo.co.jp/byline/tagamiyoshikazu/20170806-00074221，2021/1/2。

田中嘉彦，2015,〈日本の行政機構改革：中央省庁再編の史的変遷とその文脈〉,《レファレンス》，65(9): 53-82。

田原総一郎，2019,《創価学会》，東京：每日新聞。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田原総一郎，2020，《戦後日本政治の総括》，東京：岩波書店。

古賀茂明，2020，《日本を壊した霞が関の弱い人たち》，東京：集英社。

竹中治堅，2010，《参議院とは何か 1947~2010》，東京：中央公論新社。

向大野新治，2011，〈国会：「ねじれ」に見る政治のあり方〉，佐々木毅、清水真人（編），《ゼミナール　現代日本政治》，東京：日本経済新聞社，頁 328-372。

早川英男，2017，〈やってる感〉，《東京新聞（夕刊）》，2/9：1。

自民党，1955，〈立党宣言と党綱〉，自民党 web ページ，https://www.jimin.jp/aboutus/declaration/，2021/7/20。

安倍晋三、岡崎久彦，2004，《この国を守る決意》，東京：扶桑社。

佐藤優、山口二郎，2020，《長期政権のあと》，東京：祥伝社。

岩﨑健久，2019，《消費税「増税」の政治過程》，東京：中央経済社。

牧原出，2016，《「安倍一強」の謎》，東京：朝日出版社。

松岡信之，2020，〈安定した内閣支持率〉，木下真志（編），《安倍長期政権：劣化の構造》，東京：旬報社，頁 38-55。

岡田憲治，2019，《なぜリベラルは負け続けるのか》，東京：集英社。

財務省貿易統計局，2021，〈報道発表：令和 2 年度分貿易統計（速報）の概要〉，財務省貿易統計局 web ページ，https://www.customs.go.jp/toukei/shinbun/happyou.htm，2021/6/1。

高安健将，2013，〈巨大与党の出現：自民党の「復活」は何を意味するか〉，《月刊自治研》，55(651): 17-25。

首相官邸，2021，〈内閣制度と歴代内閣〉，首相官邸 web ページ，https://www.kantei.go.jp/jp/rekidai/ichiran.html，2021/7/20。

清水克彦，2014，《安倍政権の罠：単純化された政治とメディア》，東京：平凡社。

清水唯一朗，2017，〈政治主導の完成か、官邸主導の確立か：第二．三次安倍内閣の政治運営〉，《日本與亞太研究季刊》，1(3): 137-155。

衆議院，1994，〈第 145 回国会衆議院日米防衛協力ための指針に関する委員会議録第 5 号（1999/4/1）〉，国立国会図書館 web ページ，https://kokkai.ndl.go.jp/#/detail?minId=114504963X0051999040，2021/7/1。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衆議院，2013，〈第 183 回国会衆議院本會議第 8 号（2013/11/7)〉，国立国会図書館 web ページ，https://kokkai.ndl.go.jp/#/detail?minId=118505254X00820131107，2021/7/1。

衆議院，2017，〈第 193 回国会衆議院本会議第 17 号（2017/4/6)〉，国立国会図書館 web ページ，https://kokkai.ndl.go.jp/#/detail?minId=119305254X01720170406，2021/7/1。

経済産業省資源エネルギー庁，2018，《日本のエネルギー2018：エネルギの今を知る 10 の質問》，東京：経済産業省資源エネルギー庁長官官房総務課調査広報室。

堀江浩、池田健夫、平田崇浩、崔田知久、松本正生，2016，〈世論政治の現狀：第二次安部內閣以降の世論調查を語る〉，《日本世論調查協会報》，117: 27-33。

菅原琢，2016，〈安倍政権は支持されているのか：內閣支持率を分析する〉，中野晃一（編），《徹底検証　安倍政治》，東京：岩波書店，頁 33-47。

朝倉秀雄，2016，《官邸支配》，東京：イースト・プレス。

御厨貴，2015，《政治の眼力－永田町「快人・怪物」列伝》，東京：文藝春秋。

御廚貴、芹川洋一，2016，《政治が危ない》，東京：日本経済新聞社。

御厨貴，2018，《平成風雲錄－政治学者の時間旅行》，東京：文藝春秋。

塩田潮，2010，《民主党政権の真実》，東京：毎日新聞社。

読売新聞政治部，2015，《安全保障関連法》，東京：信山社。

総務省，2021，〈選挙関連資料〉，総務省 web ページ，https://www.soumu.go.jp/senkyo/senkyo_s/data/index.html，2022/1/2。

薬師寺克行，2014，《現代日本政治史：政治改革と政権交代》，東京：有斐閣。

薬師寺克行，2019，〈安倍內閣の支持率はなぜ下がらないのか / 不祥事続発でも「支持率安定」の摩訶不思議〉，《東洋経済オンライン》web ページ，https://toyokeizai.net/articles/-/315728，2021/10/1。

縄田康光，2014，〈貿易収支の悪化とその背景〉，《経済のプリズム》，132: 29-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西文部分

Christensen, R. V. 1994. “Electoral Reform in Japan: How It Was Enacted and Changes It May Bring.” *Asian Survey* 34(7): 589-605.

Lijphart, A.1994. *Electoral Systems and Party Systems: A Study of Twenty-seven Democracies, 1945-199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 Study on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Second Abe Administration in Japan:

Focussing on Non-responsive Policies*

*Ming-shan Wu***

Abstract

Why was the second Abe administration able to govern with stability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Previous studies have mostly explained it by looking at the victory of the national elections and the dominance of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This article does not intend to deny or question the previous studies; however, it will focus on "non-responsive policy" to explain the reason for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second Abe administration.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bigges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econd Ab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first is that it worked on economic policies that catered to public opinion. However, this article found that during the second administration, Prime Minister Abe also successively promoted non-responsive policie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on-responsive policies, the support of the cabinet would fall; however, it was not long before the rate of support rose again. This pattern appeared repeatedly, which had rarely been seen in Japanese politics befor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reasons why Prime Minister Abe insisted on promoting "non-responsive policies" and how he maintained cabinet support.

This article found that Prime Minister Abe employed two strategies to maintain cabinet support. First, he would implement economic policies that catered to public opinion before the national elections, and then took advantage

* DOI:10.6166/TJPS.202203_(91).0002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I-SHOU University.
E-mail:meizyou@is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of the new public opinion after winning the election to promote non-responsive policies. Second, by promoting new policies or policy ideas, the second Abe administration shaped an image of being a proactive cabinet, which slowed down the impact of the non-responsive polic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maintained a good impression of the regime in the eyes of the public.

Keywords: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LDP), The Second Abe Administration, Cabinet Support Rates, National Elections, Non-responsive Policie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